

## 觀光活動的出現

日治時期是台灣旅遊活動從「個人探險」進入「制度化」旅遊的重要轉捩點，也間接形成恆春半島觀光的雛型。根據呂紹理的研究，「旅行的制度化」包含兩種過程，一是旅遊組織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表現在一個社會中開始出現專司旅遊活動的機構，並藉組織的力量去開發並固定旅遊空間。其二是旅遊活動的普遍化過程，表現在旅遊活動媒介的普及與導引、旅遊者數量及階層的擴張與深化。日本自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中獲得大筆賠款，進而促進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擴張，更帶動海外旅遊的興起，殖民地台灣是旅遊活動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這樣的旅遊活動一方面是星期制使人們擁有休閒生活的時間，而新式教育也提供旅遊的機會，如修學旅行、畢業旅行等，加上台灣的交通工具與建設的變革與完備，提供了觀光旅遊出現的契機。除了上述政治、社會與經濟環境的大背景之下，台灣總督府下轄的運輸課、「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等公私旅行機構也不斷提供來台旅行資訊，同時各式旅館提供異地旅行者據點加上旅行手冊作為異地導覽的工具，使旅遊活動更形普遍。<sup>137</sup>

但正因為這樣的旅遊活動，主要觀看角度是展示殖民統治的成果，因此具有強烈的殖民權威、產業宣傳與神道宗教的色彩。也因此，具有日本南進象徵地位的屏東，特別是恆春半島成為重要的觀光目標。昭和3年（1927）《台灣日日新報》所舉辦的「台灣八景票選活動」中可以充分顯示屏東的這個角色。票選方法是先民眾初選，以明信片投票，選出前二十名預定地，此部分占決選成績的30%；複選再由七位官方與專業人士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決定最後八景地點，此部分占決選成績的70%，可見審查會才是最終決定結果的單位。



照5-1：鵝鑾鼻燈塔石碑（廖昱堯攝）

<sup>137</sup> 呂紹理，〈觀看文化的興起與浸透〉，《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頁343、344。